



西南考古的现状与问题

——代《南方文物》“西南考古”专栏主持辞



孙 华 (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

中国的西南地区,在自然地理上是指四川盆地、云贵高原和青藏高原三大地理单元,在行政区划上则主要包括了四川、云南、贵州、西藏四省区。这里是世界的屋脊,是中国长江、黄河和珠江三大河流发源的地方,是贯穿中国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经过的地方。西南地区的腹地也就是青藏高原东麓地区(包括藏东南、川西高原和滇西高原),被称作中国西南山地热点地区。该地区东为海拔很低的四川盆地,西邻高耸的青藏高原,从海拔几百米的河谷到六七千米的山脉交替出现。复杂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造就了这里独特的生物多样性、民族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就生物的多样性而言,这里从热带亚热带动植物、温带动植物到高寒地区动植物一应俱全。就民族的多样性而言,经过数千年的族群融合,这里迄今还生活着汉、藏、彝、回、羌、苗、瑶、白、水、侗、傣、怒、佤、拉祜、景颇、门巴、珞巴、独龙、布依、土家、仡佬、仫佬、布朗、哈尼、纳西、傈僳、普米、基诺、崩龙、毛南、阿昌等民族,是中国民族最集中的地区,蕴涵着丰富的民族志材料,是进行民族学、人类学和民族考古研究最理想的区域。就文化的多样性而言,西南地区地理环境的多样性和民族的多样性,决定了这里人们经济生活的多样性,农、牧、林、猎、渔、采集等诸种生业在这里都存在,现代宗教与多种原始宗教并存,除了普遍采用的汉、藏、彝文以外,这里还保留有东巴文经、水书等在特定宗教职业群体中流传的文字体系。西南考古是中国考古学中一个重要区域,该地区的考古资源对我们的民族考古、宗教考古、冶金考古、边疆考古以及南北文化交流考古等都能够做出重要贡献。

西南地区是我国较早开展考古工作的地区。不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该区域的考古工作主要集中在历史时期,如四川盆地崖墓的勘察与研究、西藏吐蕃时期的宗教和文化及其他区域的关系等方面,秦汉时期以前的史前考古的工作开展很少(我们所说的“史前”,是指有文字史料记录历史的时代,这在西南不同的地区结束的年代不尽相同。在四川盆地,可靠的历史时期开始于战国中期;而在云贵高原的古夜郎道沿线,史前时期却结束于西汉中期;而在其他地区,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开始更晚),就连西南的中心区域四川盆地战国以前的文化面貌也不怎么清楚。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西南史前考古取得了一系列重要发现,推动了这一地区的考古研究,部分地区的史前文化遗存的先后序列已经基本建立,并在此基础上开始了考古学文化的社会历史背景的探讨。到目前为止,西南各区域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的成果基本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西南地区的史前文化序列已初见端倪,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在西南地区三个自然地理的分区中,四川盆地的考古工作和研究基础最好,公元前3千纪以来的文化序列大体已经清楚。由于近些年来配合长江三峡水利工程开展了大量的考古工作,这一地区的考古文化面貌最为清晰,文化序列也最为完整,从公元前5千年的楠木园/城背溪文化开始,经历了涪溪口文化—哨棚嘴文化(或可作为哨棚嘴文化的两个发展阶段)、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路家河文化的发展历程,在西周后期以后才形成了楚巴文化、巴蜀文化和楚文化并存的局面(邹厚曦、白九江,2001年)。四川盆地的中心成都平原,随着平原上九个新石

器时代的古城址以及三星堆、金沙村和商业街三个中心遗址或高等级遗存的一系列重要发现,成都平原从公元前3千纪的宝墩村文化开始,经历了鱼凫村文化(或作为宝墩村文化的两个发展阶段)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新一村文化巴蜀文化的发展过程,在秦灭巴蜀后地方文化传统才逐渐融汇到秦汉文化中,已经成为了考古学家们的共识。

云贵高原是由滇东高原和贵州高原两部分组成,滇东高原散布着由多条江河串联又被这些江河间山岭分割的小盆地(当地称坝子),其中曲靖盆地、滇池盆地、昭鲁盆地、洱海盆地自古就是这个高原上人口聚集最多,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在这些地区中,过去除了广泛分布的战国至东汉初的石寨山文化系统的遗存外,更早的青铜文化遗存只知道云南剑川县的海门口遗址,其他遗址都被归入了不同类型的新石器时代遗存中。近年来,在靠近四川盆地的滇东北及黔西北的昭鲁盆地,重新梳理了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已经发现的以昭通闸心场等遗址为代表的文化遗存,并在贵州威宁县的中水地区接连发掘了鸡公山、吴家大坪、营盘山、红营盘、银子坛等遗址,出土了大量新的考古资料,该地区公元前2千纪中叶以来的青铜文化面貌已经基本展现在人们面前。通过贵州考古学者的研究,不仅提出了相当于商代后期的鸡公山文化的命名,而且排列出了鸡公山文化(即闸心场类型)红营盘文化银子坛文化(属石寨山文化系统)的发展序列(孙华,2005年,成都)。与此同时,云南省的考古学家通过发掘洱海边上的大理市银梭岛遗址,认识到这类原先被误认为是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原来是公元前2千纪中叶的青铜文化遗存(刘旭2005年与笔者的个人通讯)。在洱海地区,先前就已经发现了宾川县白羊村遗址和剑川县海门口遗址,如果我们将这些遗址出土的器物作一番比较,再参考测年数据和其他年代信息,洱海地区的史前文化从白羊村遗存海门口遗存金梭岛遗存的年代发展过程还是依稀可辨的。在滇东高原北端的四川凉山州地区,四川省的考古学者近年在这里开展了大量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该地区的史前文化从公元前3千纪开始,主要经历了横栏山文化咪咪朗等遗存大石墓遗存的大致序列,也开始显现在人们面前(江章华,2006年,西昌)。除此以外,在贵州的乌江流域,通过贵州和重庆两地考古学家的协作调查和研究,该区域史前文化经历了涪溪口文化哨棚嘴文化……十二桥文化巴蜀文化的发展过程,其过程与长江三峡大致同步(白九江、张合荣,2006年,贵阳)。

西藏地区吐蕃时期以后的考古开始很早,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上个世纪前半期意大利学者图齐对吐蕃时期以后西藏寺庙、佛像、绘画及佛教史的研究,迄今无人可以比肩。不过,在前吐蕃时期考古方面,除了澜沧江上游的昌都市卡若遗址为代表的卡若文化(约公元前3300~前2100年),以及雅鲁藏布江上游的以拉萨市曲贡遗址为代表的曲贡文化(公元前1800~前1500年)外,西藏各地区前吐蕃时期的文化序列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古工作。

其次,考古学家对史前区域间的文化关系和文化背景已有初步认识,为将考古学研究引入先秦历史的研究开辟了道路。

根据目前考古学文化的发现和研究,结合其他专题研究成果,我们对公元前5千纪以来西南地区的文化背景有以下初步认识。大约在公元前5000年前后,长江中游的人们就溯江西上,在四川盆地东部留下了楠木园/城背溪文化这样的遗存。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前后,来自甘青地区的晚期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的人们渐次南下,他们绕过了当时还相对低湿的成都平原,沿岷江和嘉陵江外围进入到了云南东北部以东的川江沿岸,将原先长江中游的新石器文化挤出了四川盆地东部。甘青地区新石器文化在向南的渐次传播中,逐渐丢弃了彩陶等原有文化因素,逐渐具有了新文化的地方特点,渝东地区和黔北地区的涪溪口文化和哨棚嘴文化,就是这些人们的遗存。到了公元前2千纪的前期,来自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二里头文化通过长江中游地区影响到了四川盆地,带来了中原的青铜器冶铸工艺和长江中下游的治玉工艺,导致了当地原先的新石器文化的蜕变。从此以后,一个具有四川盆地相对统一面貌的青铜文化(三星堆文化)和一座规模宏大的中心都城(三星堆遗址)就在先前文化和古城的废墟上形成了。在三星堆文化崩溃以后,碎裂的文化碎片开始向周围扩散,向北影响到了陕西南部的汉中盆地乃至秦

岭北麓,向南则影响到了云贵高原的北部。

在云贵高原的滇东高原地区,公元前3千纪前期,从四川盆地西部边缘南下的甘青新石器文化也影响到了这里,云南永仁县磨盘地遗址的陶器具有浓厚的马家窑文化素陶的作风,二者间应当存在着关系。到了公元前2千纪的中叶,该地区出现了最早的青铜冶金工业,在西起洱海地区东至昭鲁盆地都出现了青铜文化。不过,无论是洱海地区的早期青铜文化也好,还是昭鲁盆地的鸡公山文化也好,青铜工业似乎并不很发达,只有少量小件青铜工具出土。到了公元1千纪初期,有两股来自北面的文化对先前当地的青铜文化产生了冲击,其一是来自沿川西高原南下的某种北方青铜文化影响到了洱海地区,其二是来自成都平原的十二桥文化,该文化沿岷江南下,跨过金沙江进入了昭鲁盆地,从而使先前的鸡公山文化发生了变异。从此以后,滇东高原的青铜文化都与四川盆地和川西高原上的青铜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战国时期以后以滇池为中心的石寨山文化系统诸文化,乃至至于滇西和川西高原的石棺墓,其文化结构都有南北多种文化因素,其中像青铜兵器、工具、饰件和野兽纹等,则带有更多的来自西北和北方的成份(张增祺,1987年)。在这个南北文化大融会的时代,岭南地区文化也沿着珠江、元江而上,影响到了云贵高原,开始了高原与南海密切联系的时代。

青藏高原地区地域十分辽阔,影响这一地区的文化来源也来自于不同的方向。不同学科对于西藏神话、传说、语言、考古的研究都反映除了西藏文化和族群来源的两元性或多元性。就西藏卡若文化和曲贡文化反映的文化因素来看,前者来自甘青文化的色彩更加浓厚,而后者除了继续有明显的来自甘青的文化因素(如陶器中双耳罐的造型、纹饰中剔花纹的风格等)外,也出现了一些来自中亚的因素。在这一方面,农业考古研究的成果最能说明问题——在西藏的昌都县卡若文化的卡若遗址发现的农作物遗存只有粟粒,而在贡嘎县曲贡文化的果昌沟遗址采集到的农作物果实则有青稞、粟和小麦,其中青稞最多,其次才是粟。这说明在公元前2000年前,西藏主要是传承的是中原单一的粟作农业;而在公元前2000年后,西藏地区已经辗转接触到了源自西亚的麦作农业,先前的粟作农业成分在西藏地区逐渐减少。经过千百年对于西藏自然条件与农作物品种适应性的认识,西藏地区的先民终于选择了最适合青藏高原地区的麦类作物青稞作为当地粮食的唯一品种(傅大雄,2000年)。农作物种籽总是需要人群来输入和传播的,西藏农作物基本品种有东西两源,反映了当地文化和族群构成至少也来自于两个不同的方向,这是近年来西藏史前考古的重要收获之一。

其三,对历史时期中央王朝势力在西南地区的存在状况及其与周围族群的关系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

从秦汉时期开始,由于遗址规模增大,数量增多,再加上不少遗址叠压在现代城市和村镇下面,考古学家很少能够对一个区域内的历史时期的城址作全面调查和发掘,并根据城址的位置和规模结合文献记载,对西南历史政区进行考古学研究。不过,由于各种原因发现和发掘的历史时期的墓葬却很多,这给我们利用墓葬材料研究一些历史问题创造了条件。

西南地区秦汉以后的墓葬材料很多,就秦汉至南朝的中原系墓葬来说,它们主要分布在四川盆地及其由四川通向云贵高原的交通要道“夜郎道”及其分支沿线,如云南昭通——曲靖——昆明一线,以及昭通至黔西北、曲靖至黔西南、乌江下游一带。将这种墓葬的分布状况,墓地的规模大小、墓葬的等级现象,对照文献记载中西南地区诸郡县的地望,人们对秦汉至南朝中央王朝在西南的实际统治状况、移民分布情况、文化融合现象等有了一定的认识。在西南地区已经设置了中央王朝或区域王国地方行政机构的地域之外,还散布着大量不同于中心地区墓葬的其他墓葬形式,如船棺墓、悬棺墓、崖洞墓、石棺墓、大石墓、石盖土坑墓、窄穴土坑墓等。这些墓葬除了船棺墓集中分布在西汉以前的蜀地,悬棺墓和崖洞墓长期分散在许多不同的地方外,其他墓葬都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分布,且与中原系统的墓葬不共存,属于司马迁所说的“巴蜀徼外”不同族群的“西南夷”的遗存。

除了以上三个方面外,在西南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及工业系统、四川青铜文化与古蜀王

国关系、秦汉墓葬的分期编年和区域类型、西南民族考古和道教考古等方面,也取得了相当程度的研究,有些方面的研究深度已经不亚于中原地区。

西南考古已经取得了较丰富的成果,但由于该地区基础考古工作还比较薄弱,尽管有不少重要的考古发现,但大多数地区的考古材料缺乏系统性,区域间文化横向关系的研究的基础也欠牢靠,影响了考古研究的深入。我个人以为,西南考古,除了要在旧石器考古方面寻求新方法,提出新课题,寻求新突破外,还应当注重开展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

一、尽快完善区域史前文化序列并建立文化谱系

西南地区史前历史研究的基础是考古学文化谱系的建立,这是一项基础研究工作,缺少这个基础,其他一切推测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到目前为止,西南地区除了四川盆地的成都平原和渝东地区先秦文化的序列已经大致完整外,其余地区的先秦文化序列或仅建立了部分时段,或完全没有建立,各区域间的文化关系及文化背景研究自然也就无从谈起。因此,根据目前的考古材料的状况,先有计划地完善四川西北部的岷江上游地区、川西南部的雅砻江下游及安宁河流域地区、云南中西部的洱海地区、贵州北部的乌江流域的文化序列,继而以之为依托,开展川中北部的嘉陵江流域、云南滇池地区和曲靖地区、贵州的清水江流域、西藏的拉萨河谷等区域的文化遗存的排序、分期和编年工作。

在建设西南地区史前文化序列的时候,应当集中力量从小区域的考古材料的排序、分期、编年做起,切忌像过去一些地区那样,把不同自然地理单元的许多地方的材料铺开,看见有些不同就提出一个文化或文化类型,结果提出了很多文化的名称,还是没有弄清每个区域考古学材料的先后序列,更不要说文化分期和文化谱系了。一个地区的文化分期和文化谱系的研究,要从最小自然地理单元着手,一个小区域一个小区域开展工作,最后才能正确整合出整个大区域的文化谱系。西南地区小盆地较多,同一时期距离不很远的盆地可能存在着不同的文化,其文化现象与一马平川的中原地区不同。举例来说,战国秦汉时期的滇东高原地区,其文化的一致性已经比先前有了很大提高,整个区域青铜器的种类、形态、装饰所体现的风格都比较近似;然而,这个时期的滇东高原各个盆地陶器的差异仍然很大,如相邻的曲靖盆地和昭鲁盆地这时期的陶器就完全不同。在区域考古材料分期编年中注意这种不同技术层面器物种类的相同与不同,准确考察这些相同因素在不同小区域出现的先后次第,对于我们分析文化趋同现象后面的历史背景也将会有启迪作用。

二、加强文化间的互动及文化传播流线的研究

西南地区是中国南北文化和东西文化交流的走廊,需要有更开阔的视野去观察古代文化的传播和文化间的互动。在开展西南各相邻文化区间关系研究的同时,还应注意从技术工艺、艺术风格、丧葬习俗、贸易痕迹等多个方面探讨跨区域的文化传播和交流。这种探讨包括沿大河上下的,也包括跨越大河间分水岭的。通过这些区域间文化关系的研究,就可以结合文献、民族、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对这些文化现象所反映古代族群的分布、迁徙及各族群关系进行探讨。在西南考古研究中,北方(包括西北)古代族群沿青藏高原东麓地区不断南下,是该地区考古研究中最引人入胜的大问题。我们从历史时期的文献知道,直到南宋末期,元蒙军队远征云南的大理国,其军队就是从甘南地区出发,沿着青藏高原边缘的川西和滇西高原南下,直抵大理国首都城下,出其不意地灭掉了大理国,从西侧威胁到了南宋王朝的后方。这条被称之为“藏彝走廊”的北方古族南下的通道,至迟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存在了,种种迹象表明,从仰韶时代的庙底沟文化起,甘青地区的居民就不断南下,一直到达川西高原上的大渡河流域。西南地区类似彩陶纹样的衬花纹,具有甘青史前文化风格的双耳陶罐、青铜兵器、工具和饰件,云南、贵州、广西、西藏发现的多处岩画,有可能就是这些南下的北方古族及其后裔的的遗留。

云贵高原是多条大河流经或发源的地区,除了青藏高原东侧和东部并列南下的岷江、大渡河、雅砻江、澜沧江外,长江的支流沅水和乌江,珠江的上游南、北盘江,元江(红河)的上游礼社江都从云贵高原发源。云贵高原上的文化不仅与西北地区有密切的联系,同时与华中和岭南地

区也有千丝万缕的牵联。例如,近年在贵州东南的沅水上游清水江两岸发现的以压印有复杂纹样的白陶器为显著特点的遗存,其文化属性是中心在湖南西部地区的早于大溪文化的高庙·汤家岗文化,这种特征明显的白陶器却在珠江三角洲的深圳甚至香港都有出土(深圳称咸头岭文化,香港称大湾文化),后者显然是由前者传播而来。看来,西南考古不仅要注意高原与高原,还应该关注高原到沿海。对这一古代文化通道的研究,有助于突破我们过去对于远古文化传播和古代族群迁徙范围的认识。

由于研究文化的互动和文化传播涉及的地域很广,不可能由某一省区的考古研究单位独立完成,因此,开展跨省区的考古协作就显得尤为必要。

三、开展思想领域和宗教领域的考古研究

西南地区自古以来就有不同于中原地区的原始宗教,三星堆文化青铜器所反映的宇宙观念、宗教神话、神祇形象、祭祀礼仪,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石寨山文化铜贮贝器上的立体群像和铜鼓表面的阴线图像,反映了那时的滇人及相关族群的祭祀场面、宇宙观念和神人关系,是我们了解当时滇人及其相关古族精神世界的窗口。对于这些包含着大量史前西南古国的宗教信息的文物,需要系统和仔细地分析研究,才能将零散的图像信息联缀成一幅当时社会宗教的画卷。

西南地区的四川是中国本土宗教道教的发源地,道教产生于这块土地上,它必定从当地的原始宗教中吸取某些理论依据、神祇系统、仪轨行为。从四川及其邻近地区汉晋墓葬中出土的宗教色彩的文物,给我们在当地原始宗教与以后的道教之间建立关联提供了有用的线索。在西南的四川地区,目前还保留着大量的六朝以来的大量道教石刻,道教龕像数量之多为中国之最。其中“仁寿县千佛寨的道教石窟题记中保存有关于道教经典的最早而且完整的记录,不仅比权威的《开元道藏》还要早,而且与《开元道藏》的记录有很大的差异。”(引自罗炤教授为《四川石窟内容总录》撰写的序言),道教考古将是西南考古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

佛教在汉代传入中国后,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是混迹于中国传统的神仙体系内,以至于南北朝以前的佛教文物好似凤毛麟角。在这不多的早期佛像中,西南地区又是全国佛像数量最多的区域,除了四川盆地以外,在贵州的汉墓的铜摇钱树干上也有佛的形象,云南昭通汉墓还出土了体量较大的模制陶佛像。有学者基于西南早期佛像的发现,提出了佛教通过云南传入中国的所谓“南方丝绸之路”的问题。这种说法尽管不能成立(因为西南已经发现的佛像都是分布在以成都为中心的汉墓文化圈内,在云贵地区发现的汉墓及其佛像更是在四川通往云南曲靖的古夜郎道沿线及其支线上,这些墓葬和佛像都是从四川北来而非南来),不过模铸摇钱树和模制陶俑中的佛像都是市作坊批量化生产的产品,佛像出现在这些产品中,说明佛的形象已经在这一地区人们的心目中得到了比较广泛的认同。这为以后四川地区佛教造像的兴起铺平了道路。从南北朝开始,西南的中心地区受到了当时政治中心的影响,佛教造像四处流行开来。到了唐代的“安史之乱”以后,受战乱的影响,中心地区佛教造像之风陡然停止,许多著名的佛教僧侣和艺术家躲避战乱来到了西南的四川,使得四川成都成为当时佛教及其艺术的中心,佛教造像活动异常活跃。以成都大慈寺为中心,佛教向北影响到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走廊,向南影响到了云南的南诏和大理。从那以后一直到南宋末期(甚至到明代),四川各州县纷纷开窟造像,留下了大量的佛教石窟和精美绝伦的造像,其中有一些佛教艺术题材和形式还是从四川开始风靡全国,如成都大慈寺创造的《十王经》及其图像。此外,西藏的苯教及佛教的分支喇嘛教,在西藏对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更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不了解这些宗教就无法深入开展这个时期的西藏考古。所有这些,都需要我们考古研究者关注西南地区的宗教考古,宗教考古今后是西南考古的重要内容。

四、重新启动并强化西南民族考古

西南地区山高林密,交通困难,古代的统一事业相对进行得十分缓慢。直到今天,西南地区还生活着中国数量最多的民族。这些民族的经济形态和文化差异很大,给我们开展民族考古提

供了一个很好的样本。

西南的民族考古是在大量民族调查和民族志资料积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由于传统考古学在古代遗存的功能解释、物质遗存所隐含的非物质的文化现象的解释和社会历史背景的解释存在着局限,因而一些受过民族学和人类学训练的学者就试图采用民族志的资料与考古学材料进行类比,以解决研究这些遗存所遇到的问题。随着大批民族志材料在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陆续公布,一批中国的考古学家开始了中国民族考古学的探索,除了发表了一批有影响的学术论著外,还就民族考古学的概念、方法及其与其他考古学分支的异同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云南的汪宁生、四川的童恩正、北京的李仰松等先生都是这个时期的代表性学者。不过,在先前中国的民族考古学的实践中,的确也存在着某种简单类比和研究不成系统的缺陷,从而影响到民族考古的走向深入。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中国考古学界已经很少听到民族考古学的声音,有学者还对民族考古学的概念、方法和实践提出了批评,认为民族考古学不能作为考古学的一个分支。我个人以为,考古学的基本方法本来就其他学科借用过来的,考古学的对文化现象的解释更要不断依靠其他学科的新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如果考古学家能够正确地运用民族学的理论和材料,就可以给我们解释考古学遗存现象和探索史前文化多提供一个很好的类比对象和参照体系。具体到西南民族考古方面,我以为应当注意以下问题。

首先在民族考古的资料上,考古学家不能简单地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完全依靠民族学、社会学等专家的调查记录,而应当根据考古学的特点,亲自制定调查计划,并亲自进行调查,从而得到真正对考古学研究有用的第一手资料。其次是要有针对性地对一个少数民族村寨、一群有亲缘联系和经济联系的村寨、多群无任何联系的村寨进行系统细致的考察,对这些村寨房屋建筑的内部功能布局、不同功能房屋的分布、村寨人们的经济活动及其活动范围、村寨间联系的方式及密切程度、婚丧嫁娶等活动的礼仪过程、村寨曾经有过的等级差异和宗教习俗等对考古学研究有用的信息都进行记录,做到信息的系统性。其三是要把考察对象设定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要注意在可以考察时间范围内考察对象的各种变化,找出导致这种变化的内部或外部原因。此外,西南地区自建国以后,随着边远村寨向交通方便地区的迁徙,退耕还林和小城镇建设等计划的开展,一些原先延续了很长时期的村寨被废弃;还有一些村寨因为失火等原因,另外选址重建了村寨,原来的村寨已成废墟。选择一个或数个不同地貌环境、不同毁弃原因的村寨遗址进行调查和发掘,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古代遗址的平面遗存现象与该遗址未毁弃前实际可能的立体空间景观之间的关系,都有莫大的帮助。

五、重视以金属冶铸为重点的工业考古

在中国地球化学省的分区中,中国西南地区正处在华夏省与扬子省的衔接地带上,埋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四川、云南、广西三省铜矿蕴藏极为丰富,其中还有丰富的自然铜的埋藏,这就为古人开采利用这些铜矿提供很大方便。这里还位于世界最大的滇缅锡矿成矿带上,是世界上少数产锡的地区之一,这对探讨中国青铜中锡的来源问题也会有一定的帮助。不过,到目前为止,西南地区的冶金考古研究起步并不久,真正意义上开展冶金考古研究的时间是上世纪的80年代初。当时北京钢铁学院的学者与云南和广西的学者们合作,分析了上百面铜鼓的合金成分、金相组织和铸造工艺。此后比较有意义的研究主要是对四川广汉三星堆器物坑出土铜器的科技分析。近十多年来,通过对中原殷墟、江西新干、四川三星堆青铜器的铅的同位素分析,得知这些铜器含有一种罕见的高放射性成因铅,这些铜器中所含的异常铅是来自铜料,根据地矿资料信息,目前所知的比较接近的含异常铅的铜矿是在滇东北地区,因而有学者认为,包括安阳殷墟在内的商代中后期的青铜器的铜料来源是来自云南东北部的一个未知古铜矿。如果这种推断成立,中原商王朝青铜器所用的铜料不是来自中原附近而是来自遥远的西南地区,而是来自遥远的滇东高原上。这个推断,不仅大大超出了人们过去的想象,也超越了考古材料反映的文化通道的信息。人们在兴奋之余不禁要问,商王朝的人们是否有能力来到秦汉王朝都难以统治的滇东高原上开采或购买铜料?是什么力量驱使商人要舍近求远到遥远的滇东高原上去

获取铜料?为什么在考古发现中见不到商王朝与滇东高原存在联系的任何遗存?这些问题必将促进西南地区早期冶金考古的研究。

根据云贵高原青铜时代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西南地区普遍在公元前2千纪中叶开始制造和使用青铜器,除了四川盆地的三星堆文化外,在云贵之间的鸡公山文化、云南洱海一带的银梭岛文化、乃至西藏高原上的曲贡文化都有这各时期的青铜器出土。由于云贵高原和西藏地区的史前文化的面貌与中原地区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而与西北地区史前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不少考古证据都透露除了自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甘青地区的就不断发生族群南迁和西迁,从而将其文化因素传播到云贵高原和青藏高原上的信息。甘青地区是中国最早出现青铜器的地区,夏代及其稍后的甘青地区与中原地区一样,是当时中国并列的两个青铜器技术和艺术中心。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人们不禁要问,西南地区的青铜冶铸技术的出现是否受到了甘青地区的影响呢?具有一些中原及长江中下游青铜器特征的四川盆地的青铜冶铸技术对云贵地区青铜技术的兴起是否也有刺激作用呢?这些问题都说明,西南地区的冶金考古研究,是西南考古中的重要课题,它对我国西部地区一些重要考古问题的解决也必将有非常大的推动作用。

由于西南地区冶金考古比较薄弱,需要从最基本的方面着手进行解决,以求有所突破。首先需要加大对出土金属器物(铜、铁、金、银)成分和结构分析的力度,广泛开展金属器物特别是青铜器铸造技术方面的研究;其次是要对发现的炼渣、陶(石)范、坩埚等冶炼遗物的技术分析。由于目前西南地区仍没有发现年代较早的采矿和冶炼遗址,因此还应该加强这方面的考古调查,寻找古铜矿和锡铅矿的线索。

六、积极审慎地将考古研究引入历史的研究

中国西南的四川盆地,是中原地区和吴越地区以外另一个保留了先秦古史传说且文化传统没有发生中断和转移的地区。四川三星堆、金沙村和商业街遗址的发现和发掘,尤其三星堆两个器物坑的发现和金沙村祭祀地点出土的大量器物,更给人们探索传说中的早期蜀国提供无与伦比的丰富信息。因而一些考古的和非考古的,专业的和非专业的人士,已经对三星堆和金沙村遗址考古现象后面的历史背景作了许多探讨和演绎,有的结论已经大大超过了考古材料本身透露的信息和基于这些实物材料可以做出的推论。云南的滇池地区是文献记载中滇国的统治区域,在这里发现了石寨山、天子殿、羊甫头等多个高等级滇国贵族的墓地,特别是在一座墓葬中出土了“滇王之印”的金印,证实了文献关于滇国的记载。不过,在西南其他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历史观察还做得很不够,一些有条件从考古材料提出和解决的历史问题,目前仍然还是众说纷纭的谜团。

这里我想谈一下古夜郎的问题。夜郎是司马迁记述过的西南族群中的滇东高原核心地区的强邦大族,关于夜郎的地望,学术界有贵州桐仁县说、兴仁兴义县说、赫章县可乐遗址说、云南昭通市说、曲靖市说、湖南新晃县说等多种不同的看法。我曾经指出,在以上多种观点中,只有任乃强的云南曲靖说最符合考古材料所揭示的信息。因为在整个云贵高原上,夜郎国存在的战国秦汉时代最强盛的文化系统是石寨山文化系统,该系统中滇池地区的石寨山文化已经证明是滇文化,而在司马迁等人的记载中,滇与夜郎、邛都等都属于“君长以什数”的“魋髻,有邑聚,耕田”的古族,其中夜郎最大。因此,夜郎国的遗存必定与滇国一样,位于石寨山文化系统的分布区内。石寨山文化系统的分布区东不过贵州西部,基本上是在滇东高原上,据此,那些将夜郎推定在滇东高原以东地区的说法都应当放弃。夜郎在文献中的位置是在滇国以东,滇池地区以东的最大、最居中的盆地就是曲靖盆地,曲靖盆地是汉代“夜郎道”的南端终点,这里的南盘江和稍东的北盘江又与文献中连接夜郎与番禺的牂柯江相吻合,将夜郎国的中心推定在曲靖应当是非常恰当的。曲靖一带有不少石寨山文化系统的大型墓地(其中八塔台等墓地的考古材料已经部分发表),其墓地的规模和遗存的丰富程度也与历史上夜郎国的身份是相符的。

西南地区的许多地区在历史上一直处在中央王朝、世族大姓、地方豪酋三种势力的交互作

用之下,其中世族大姓原本是早先来自中央王朝直接统治区的移民,他们熟悉中央王朝的典章制度和当地实际情况,在中央王朝势力的边缘地区逐渐壮大了自己的势力,成为介于中央王朝与当地少数民族豪酋之间的一股重要的势力。他们在中央王朝力量强盛时协助中央在当地的各级行政机构实施统治权力,而在中央王朝力量衰落时又与当地少数民族豪酋一道排挤中央王朝的势力,成为研究西南历史不可忽略的重要方面。三国时期在南中反叛蜀国的南中大姓,南北朝时期显赫一时的云南爨氏家族,唐末至明末的贵州播州的杨氏家族,以及元明清时期诸多土司,就是这些世族豪酋的代表。这些世族大姓遗留下的丰富的文化遗存,其基本面貌与中心地区相同,却又有相当的保守性和较长的传统延续性,给我们历史时期考古研究提供了绝好的资料。据悉,贵州省的考古学家正打算系统地记录、发掘和研究遵义的杨氏家族的墓葬,这就是一个很好的选题(王红光,2006年)。我相信,通过系统地考察这些世族大姓家族墓葬的发展演变过程,分析比较其与周围其他地区的相关墓葬的关系,不仅可以为这些区域的文化遗存发展史的研究提供一把有用的标尺,而且有助于加深对当时世族大姓之间、世族大姓与中央王朝的地方政权和土著豪酋等相关社群关系的认识。

以上,我借《南方文物》的宝贵版面讲了一通西南考古的情况以及我个人以为应当关注的研究课题,目的是提请从事西南考古研究的学者们注意该刊物近期的变化。《南方文物》自从创刊以来,就一直关注西南地区考古资料的报导和考古研究成果的发布。为了提高杂志的学术水平和刊物声望,《南方文物》决定在加强来稿审查的基础上,开办一些专栏,约请了解某一区域或某一专题的学者对即将在专栏发表的文章进行评议。我以为这个决定是一个很好的举措,为中国学术界重开学术批评的风气开了个好头。中国学术界在上个世纪50年代之前,曾经有很好的学术批评的氛围,学术就是在这种不断批评,反复讨论的过程中不断向前推进的。从那以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针对论著的学术评议一度变成了针对作者的政治批判,从而影响到真正的学术批评。批评者在考虑评议某一学术论著之前,首先考虑的是会不会影响自己与被评议者之间的人际关系,因而在评议时尽量减少批评的色彩;而受到批评的作者,有的也没有接受批评的度量,往往会立即还以颜色,甚至将正常的学术批评上升到私人恩怨。在这种学术的氛围中,报刊杂志上发表的不少书评,给人的印象就好像书商卖书的宣传广告一样。在新闻出版事业不断昌盛的今天,我国的刊物数量已经达到了每年4万种,是美国刊物数量的四倍,但在这些刊物中刊载的文章有多少真正推进了学术进步呢?《南方文物》“西南考古”等专栏的开辟,以及给专栏的每篇论文加写评议的做法,或许多少能够改变目前考古学术刊物死气沉沉的现象,并且给这份已经创办多年的刊物带来清新的气息。我衷心希望致力于西南考古的研究者能够将自己的力作投递给这个专栏,同时希望这些研究者愉快地接受其他学者的评议。

在学术的海洋中,批评的和风荡起的涟漪终究胜过平静的死水。

栏目主持人介绍

孙 华:

男,1958年生于四川绵阳市,现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主要是中国青铜时代考古和中国城市考古,主持过教育部“四川地区先秦文化研究”、“滇东黔西的青铜文化”等课题。发表过《四川盆地的青铜时代》、《神秘的王国——对三星堆文明的初步理解和解释》、《中国艺术通史·夏商周卷》(合著)等专著和多篇论文。



本期刊载了张昌平先生的《自产与输出——从纹饰风格看三星堆铜器群的不同产地》和李明斌先生的《论四川盆地的秦人墓》两篇论文。

一、张昌平《自产与输出——从纹饰风格看三星堆铜器群的不同产地》：

三星堆器物坑青铜器自发现以来，就以其雄奇诡异而令世人瞩目。不过，不少研究者已经注意到，三星堆文化中包含有许多东来的文化因素，如三星堆陶器中保存有典型的中原二里头文化的传统，三星堆玉器中蕴含着浓郁的东南良渚文化的气息，中原、长江中游和江淮地区青铜器与三星堆青铜器中的饰牌和容器有直接或间接的源流关系等等。由于三星堆文化的独特性，该文化中不见于其他地区和文化非容器类青铜器很难通过造型比较来判断其年代和产地。因此，通过铜器的纹饰和纹饰构成元素来探讨这些问题，是“我们观察三星堆文化不同类别器群的最好视角”（张昌平语）。

我们知道，中国的考古学家们在分析陶器时，往往细致入微，学界中流传着某大学问家闭着眼睛摸陶片就可以判定陶器文化属性的佳话。然而，中国的学者在研究铜器时，却往往显得粗放（包括我自己），很少从小处着手，注重细节，由小见大。可喜的是，近年来已经有学者开始从粗放转入细致，出现了数篇具体分析铜器细节并从中引导出大问题的好文章，张昌平的这篇论文就是其中之一。张昌平《自产与输出》一文，将三星堆的非容器类铜器的纹饰划分为四类，论述了这些铜器的纹饰大部分源自于二里岗文化时期的商式铜器，但多数纹饰的结构、组合已经与商式铜器有较大的变化；然后通过三星堆非容器类铜器与尊、罍、甗等容器类铜器纹饰的比较，指出两类铜器的纹饰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即使相近的纹饰，也只见来自四川以东的容器纹饰对非容器器类纹饰的单向影响，而绝对不见非容器器类纹饰对容器纹饰或装饰风格的影响。据此，张昌平得出了三星堆容器和非容器两群铜器不大可能属于同一文化和同一产地的结论。这个结论尽管没有能够完全解决三星堆铜器产地的问题，但却是中肯和恰如其分的。

三星堆铜器究竟是自产还是输入，这包括了两个方面的问题。就自产来说，这些铜器是三星堆这个都城生产的呢还是都城以外的其他城邑或工场生产呢？就输入来说，这些铜器究竟是同一文化圈产品的输入的呢还是其他文化圈产品的输入的呢？这些输入铜器的原产地及输入路线又是怎样的呢？这些问题都需要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才能逐步予以解决。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苏荣誉教授曾经告诉我，他甚至怀疑三星堆器物坑的非容器类的铜像设也不是三星堆遗址人们铸造的，因为有些大型铜面像用于固定的穿孔不是在铸造时预留的，而是在铸造后切割凿穿的，在当时技术条件下，凿这些孔比重新铸造都还费事。在三星堆遗址中，至今都没有发现铸铜遗址，这似乎从一个侧面支持着苏先生的这个推测。看来，三星堆青铜器究竟是自产还是输入，还需要作更多更深入的研究。

二、李明斌《论四川盆地的秦人墓》：

自上个世纪50年代四川广元宝轮院和重庆巴县冬笋坝的船棺墓被误定为巴人墓葬以后，四川盆地的战国晚期至汉初墓葬墓主的族属问题就一再出现判别的错误。例如成都羊子山172号墓先是被当作战国后期的蜀人墓，后来又被认为是秦代的秦人墓；青川县郝家坪墓地刚被发掘时也一度出现族属判定上的困惑，好在有秦《更修为田律》出土，为该墓地族属问题提供了直接的信息；荣经县曾家沟古墓群也是先被当作楚移民的墓葬，并被一些历史学家作为楚国贵族曾分封为岷山庄王的证据，后来才有学者通过仔细分析，将其判定为秦人墓。由于四川盆地的战国晚期墓葬族属的判定关系到秦、楚、巴、蜀之间的彼此关系，牵扯到秦灭巴蜀后在四川地区的统治方略等重要历史问题，因此，李明斌《论四川盆地的秦人墓》试图在四川盆地的战国晚期墓葬中，首先将相对容易区分的秦人墓葬区别出来，这无论从论文的选题还是题目的切入点来说，都是重要和恰当的。

论文作者通过青川郝家坪、成都龙泉驿、荣经曾家沟和古城坪墓地的讨论，论述或强化了这些墓葬应当属于战国秦人墓和秦代秦人墓的观点，根据这些确切无疑秦人墓的文化现象，归纳出了四川秦人墓的特点，并对处在巴蜀文化传统区和秦楚争夺四川大背景下的秦人墓的文化结构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论文作者对四川秦人墓的性质、背景、作用进行了阐述，其中对战国秦人墓分布广于和数量多于秦代秦人墓现象的揭示和解释，



都是应当称道的。不过,就我个人的喜好来说,我以为李明斌这篇论文最值得关注的还是第四部分:四川盆地内部分秦代墓有关问题的分析。这一部分是在明确了四川秦人墓特点的基础上,对那些在是否属于秦人墓问题上有认识分歧的重要墓葬进行讨论。讨论的结果是,成都市羊子山 172 号墓、大邑县五龙乡 18、19 号墓尽管文化因素比较复杂多样,但都是以蜀文化因素为主,应当属于蜀人墓而不是秦人墓。至于重庆涪陵区小田溪墓群,论文作者与其他研究者一样,都认为它们是巴人墓而不是秦人墓,将族属问题不大的小田溪墓地与上述墓葬放在一起讨论,我推测作者的意图是用秦代的巴人墓反推秦代的蜀人墓,并非没有意义。

本文不足之处主要是在四川盆地楚文化的论述上。文章认为“四川盆地内没有发现楚人墓地”,这不够准确。在四川盆地东部的重庆沿江地带,现已在忠县、云阳、奉节等多个县市发现有战国中晚期的楚国墓地,楚国势力在秦灭巴蜀后仍然存于川东平行岭谷地区与秦国对峙,这是考古材料新揭示的历史现象。关于楚文化在四川盆地的存在及其影响,还需要根据新材料重新思考和认识。

简讯

考古学家聚首贵阳话协作

第3届西部考古协作会暨云贵高原史前文化研讨会于2006年8月28~31日在贵阳召开。李伯谦、白云翔、王仁湘、孙华等著名学者出席了研讨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重庆师范大学以及中国西部省区考古所的近50名学者就西部地区的考古与协作等问题进行了广泛交流。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王红光所长主持了开幕式,贵州省文物局侯天佑局长代表省文化厅向大会表示祝贺。学术研讨会由北京大学文博学院孙华副院长主持。

与会专家介绍了他们的新发现、新成果以及相关课题的进展情况。如安宁河流域考古学文化分析、大渡河上游史前文化研究、北盘江流域考古调查与发掘、乌江上游考古新发现、广西右江流域新石器时代考古新进展、沅水中上游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滇东黔西的考古调查、早期秦文化的调查发掘与研究、道教考古研究等,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兴趣。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副所长白云翔在发言中认为,区域考古是中国考古学的一个基础性的工作。如何加强区域性考古合作、地理环境与人类文化的关系、古代文化与当今民族的关系、周边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关系等等,都是西部考古值得关注的课题。而西部考古协作,对推动西部考古将产生重要作用。

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李伯谦提出了建议:1、区系类型建立之后,要继续完善、细化,同时还要研究彼此之间的关系;2、考古学要强调多学科结合;3、加强对国外考古学理论的研究,并与中国考古学实践相结合;4、运用现代科技为考古学服务,加强科技考古的研究;5、加强考古学和文物保护的关系的研究,要积极参与文物保护工作。

西部考古协作会由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倡议,对西部地区考古工作的进步起到了推动作用,前2届分别在兰州、成都召开,第4、5届将在广西、云南举办。

(转引自《中国文物报》2006年9月6日第2版)